

世界著名文学奖获得者文库

美国卷

钟归阿达诺

〔美〕约翰·赫西 著

申惠辉 主编

工人出版社



世界著名文学奖
获得者文库

(美国卷)

钟归阿达诺

(美) 约翰·赫西 著
申惠辉 主编

责任编辑 莫 多
封面设计 潘岱予
装 帧 潘岱予

世界著名文学奖获得者文库·美国卷

钟归阿达诺

申慧辉 主编

工人出版社出版（北京安外六铺炕）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昌平长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6×1168毫米 1/32 印张：9.625 字数：232000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 —9060册

I S B N 7-5008-0202-1/I·49 定价：2.70元

前 言

“世界著名文学奖获得者文库”美国卷问世了，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此卷收入了美国普利策文学奖1945年获奖作品《钟归阿达诺》。作为“世界著名文学奖获得者文库”的丛书之一，有必要首先介绍一下该项文学奖的来历及地位。

普利策文学获在美国文学界地位颇高。这并非在于奖金数量的多寡（一项普利策获的奖金最高不过1000美元），而在于评委会强调作品的文学价值，且标准较高，加之许多饮誉世界文坛的知名作家都曾是美国普利策文学奖的得主，如辛克莱、路易斯、约翰·斯坦贝克，厄内斯特·海明威，罗伯特·潘·沃伦，威廉·福克纳等，所以普利策文学奖便被视为衡量作家作品最重要的标准之一了。

普利策奖系根据美国报刊出版商约瑟夫·普利策（1847—1911）的遗属所设。约·普利策一生中办过多种报纸，成绩卓著。他曾在生年资助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新闻专业的研究生院。他去世后，有关机构专门成立了一个顾问委员会，自1917年5月起，每年向新闻界、文学界人士颁奖一次。委员会由记者和大学教授组成，秘书由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生院的教职员担任。

普利策奖共分三个方面十五项奖。文学奖共分六项：小

说、戏剧、历史、传记、诗歌、以及不包括在上述五项奖之内的其它图书奖。此外还有一项音乐奖，八项新闻奖。文学奖主要授予以美国人与事为主题的优秀作品。

《钟归阿达诺》是美国作家约翰·赫西（1914—）于1944年出版的一部小说，它讲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军在欧洲战场上的一段故事。该书情节生动，人物塑造极为成功，被认为是美国战争题材作品的一部经典。追溯一下美国文学史上以战争为题材的作品之发展，将有助于我们了解《钟归阿达诺》在其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它的文学价值。

在美国文学史中，战争题材的小说向来是一个重要的支脉。关于南北战争的作品，流行最广的要算《汤姆叔叔的小屋》和《飘》，而在文学史上地位较高的大概当推斯蒂芬·克莱恩（1871—1900）的《红色英勇勋章》（1894）。《红色英勇勋章》以印象主义的手法描写士兵在战争中的具体感受，如孤独、恐惧、牺牲等，对20世纪的反战作家产生过影响。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海明威的《太阳照样升起》（1926）和《永别了，武器》（1929）可算作代表作品。海明威继承了克莱恩的传统，将个人感受作为叙述的视角，着重表现士兵对战争及整个资本主义暴力世界的失望与悲观，彻底否定了资本主义宣传机器对战争的所谓“光荣”、“神圣”、“牺牲”的粉饰。可以说，这种反战的传统一直在20世纪的美国战争文学中占主导地位。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此后战事的文学作品，大致也都可看作是这种文学传统的继续。其中可被称作经典作品的，除了60年代问世的黑色幽默代表作《第二十二条军规》，出版较早、影响较大的就是约翰·赫西的这部《钟归阿达诺》了。

《钟归阿达诺》描写的是1943年的欧洲战场，1944年即出版发行。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无论从题材的新鲜还是从读者的兴趣来讲，《钟归阿达诺》在问世之际所引起的

轰动和影响，都是后来出版的同类题材的作品所不能比拟的。它赢得了1945年的普利策小说奖，在此后的几十年里，一直被认为是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典作品。时至今日，翻开这部曾在40多年前轰动一时的获奖作品，我们仍能感受到它的艺术感染力，仍能体味到它的社会批评的力量。

《钟归阿达诺》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它塑造了一个正面形象，一位优秀的美国军官和为民主而战的斗士。在他的身上，作者倾注了他对正义、平等、民主、自由等理想的热爱之情，同时也凝集了美国人民对奔赴远方前线的亲人的关心与期待。正是这些与时代脉搏和读者兴趣密切相关的成份，为作品的成功奠定了基础。此外，作者从他作为战地记者的亲身经历出发，揭露了他所了解的美军上层人物的官僚主义和专横跋扈等恶劣品质，从而增加了作品的现实主义力度，并在更深的层次上反映了二次大战期间的美军状况。从《钟归阿达诺》的现实主义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到《第二十二条军规》以荒诞、夸张的手法表现的种种现象的真实依据。

《钟归阿达诺》是描写战争的，但是它并没有直接描绘战斗场面。它选择了一个新鲜的视角，描写美军在欧洲登陆并占领了法西斯统治的意大利城镇后，是如何安定人心、重建秩序的。作为一镇之长的美军少校约波洛，尽心竭力、恪尽职守，为保证美军的胜利贡献着绵薄之力。他关心民众的疾苦，认为这是解放者的义务；他密切注视法西斯残余的动向，将他们视为破坏战势的有害因素。然而，他万万没有料到，他的真正敌人不在这里，而在他们军队内部，就在那些官僚当中。约翰、赫西的描写是成功的。他用富有表现力的语言描写了一个普通军官的善良和正直，突出地刻划了他在官僚制度面前的无能为力。

《钟归阿达诺》的另一个成功之处是，作者塑造了一群生动的意大利普通人。在这些曾经倍受法西斯压迫的人民身上，作

者寄予了无限的同情。他描写他们对美军的欢迎与期待，对自由和安宁的向往，也描写他们的贫困和落后，肮脏与懒惰，但更多的是描写他们对压迫者的仇恨，对解放者的衷心感激，以及他们对生活的热爱。说话时爱作手势的警长、执着地追求艺术的老画家、从来只讲反话的摄影师，以及热心肠的译员等人物，都是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赫西长于运用对话式语言，书中的许多场面都是用对话来描写的。这种方法将人物形象立体化，使人物的性格与音容笑貌结合在一起，具体、生动，十分逼真。

《钟归阿达诺》对人物的成功塑造早已得到评论界的肯定，引人入胜的情节也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然而这些长处并没有完全概括它的文学价值。表面上看，《钟归阿达诺》描写了一个正直的美国军人，歌颂了他的正义行为可是掩卷之后，谁都无法否认它给读者带来了难以驱散的愤懑不平之感。也许在作品刚刚问世时，美国读者关心的是美军将士如何英勇作战、为世界争取和平的英雄壮举，但是作品中透出的对军队官僚制度的批评却含有一股压倒一切的力量：约波洛少校尽管足智多谋，且秉公办事，可还是被不明不白地解除了职务。公正在这里似乎太软弱、太微不足道了。这个问题在开放式的结尾部分已经留给了读者。

在较早的战争题材作品里，我们看到两种理想的斗争，两种力量的对峙；在描写一次大战的作品里，我们开始看到一个对战争厌倦、对现实失望的美国军人；在《第二十二条军规》中，我们接触的是整个腐败丑恶的制度。在这个由歌颂理想与正义、到描写个人对战争的恐惧乃至绝望、及至到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失望的文学主题演变中，《钟归阿达诺》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环，而这，正是这部四十多年前的获奖作品仍旧值得译介的真正原因。

申慧辉 1988年3月

新 版 序

我曾经为这本书的前几版写过一篇序，开头的几句是这么说的：“美国军人维克托·约波洛少校是条好汉子。这您一定会看到的。我想让您知道他的故事的全部理由，惧在于兹。”

此后，特别是在战争结束之后，我又认真想过，觉得约波洛的乐观的天赋才能还不能算是我立意写下这部小说中那些事情的全部理由。这本书是我于盛怒之中匆匆写就的——只用了1943年9月之中的三周时间——我选了一个比一般盟军军事政府官员要强得多的人，约波洛，作为主角；又选了一个比一般正规军军官差劲得多的人，马尔温，作为他的对立面：这是因为刚刚从前线回来，还有两个问题使我大惑不解，激动不安。

第一个问题在我们的西西里登陆之役开始之后一分钟就变得十分明显了，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原来的那一套设想——先全力以赴把仗打赢，和平时期的问题以后再说——是不大行得通的。我们一踏上轴心国的国土，问题就再清楚不过了，即这种政策只会把战争时间拖长，而和平时期也没有和平。没有政治谋略的战争都是失败的战争，即使战胜了也充其量不过是皮洛

士式的胜利。①克劳塞维茨②的名言，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当然包含着某种必然性；但是，战争已经变得如此之危险，以致我们今天着实担心，担心战争真地将把我们交战的战场这小小的寰球也化作一团齑粉。有鉴于此，至关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务必要想出一种新的、更为广泛的政治谋略来，它无须不可避免地扩大成为战争。1943年9月，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们都还没有认真地去想过，这场战争究竟代表着什么样的政治。我们想的是打一场无关政治、不问政治、脱离政治的战争。我们美国人认为，我们可以打一场技术战争：我们生产出许多武器，尽快运到前线，运用战略战术和武器装备一举粉碎敌人。1943年秋天，我们开始粉碎敌人的物质力量，然而我们却没有用多少脑筋去想想怎样粉碎敌人所表现出来的内在特质，那些使敌人成其为敌人的东西。到了和平时期，我们才开始慢慢地弄懂我们在战争中没有弄懂的东西，即所谓国际政治这个干巴巴的短语中那令人不胜其烦、庞杂无比然而又至关重要的含义——可叹的是，已经有迹象说明，我们一边学，一边就又在忘却。正因为如此，我很高兴现代图书社决定给我这本书——这本小小的醒世之作——一个传诸后世的机会。

我写这部小说时，第二个令我为之不安的问题是一个大多数在我国军队中服过役的公民共同感到关切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我们的国家永远不可忘记，军事制度与民主制度是相互矛盾的；无论武器力量将继续发挥多么重要的作用，我们永远不

① 皮洛士式的胜利：即“得不偿失”的胜利。皮洛士（约公元前318—272）是北希腊伊庇鲁斯的国王，梦想效法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在东方建立一个大帝。公元前280年，他率军渡海进入意大利，与罗马进行争霸战争。公元前279年，双方激战于奥斯库兰城。皮洛士虽然取得了是役的最后胜利，但是付出的代价极高。皮洛士战后惊叹道：“再来这样一次胜利，我就要变成光杆司令了！”“皮洛士的胜利”遂成典故。

②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1780—1831）：普鲁士将军。军事理论家，著有《战争论》八篇。

可忘记，军队中的这种生活方式能腐蚀升上了高位的弱者，它还能毁灭没有升上去的强者。在所谓绝对控制权中，存在着一种非民主的东西。这种绝对控制权无非表现为一个小小的标志，一颗星、一头鹰、一片叶子或是一道杠，扛在肩膀上，或是别在领子上，它便使一个人高踞于所有其他佩戴小一级标志的人之上，而不管他们的才干相对高低如何。这种僵死的命令主义的制度在战争中或许是必不可少的，但这并不能使它与我们的哲学相协调。然而，这套制度能使自己变得非常引人注目，并且，只要赢得了战争，它就能让人们接受它。说到这个问题，我得郑重声明一下：我在这部小说中塑造了反面人物马尔温将军，但目的不在于非难任何个人。如果说我的读者把我们众多的将军中的这一位或那一位与马尔温对上了号，那么我恳请大家注意，这大概不过是因为这个人或那个人碰巧是我所要攻击的那一类人物中的一个特别恶劣的实例罢了。我们要攻击的那种人，可能是个杰出的军人，但却是个很糟糕的社会领袖。我要讽刺的是一种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既使是在和平时期，在民事机构中，也都会充分表现出来。所以，我就更加高兴现代图书社再版我的书，它或许会使人们继续关心这个问题——无论它的作用是多么有限。

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约波洛身上的正面品质在我的心目中当然占着重要的地位。这是因为我过去认为，现在仍然认为，我们关于未来和平的种种计划上是否有了能将它们付诸实施的人的前提下才是有意义的。在本书初版序言中我曾这样说到过约波洛：“虽然其貌不扬，未通世故，但他是条好汉子；他在阿达诺做到了的和没能做到的恰如一幅缩影，展示出了美国在欧洲能做到的和做不到的事情。”我衷心希望历史的进程将证明我说的这番话幸而未言中。约波洛这个人幼稚，天真，满脑子空想，讲求“实际”的人只觉得这类人物可笑。但是我

也还年轻，我要为“天真”三呼万岁！天真会使人碰得头破血流，可那又算得了什么！头破血流就头破血流！要是没有了那些非常天真的人——或者说非常勇敢的人——没有他们甘心情愿去碰了头破血流的话，那么作为我们这个社会的基础的那些理想与原则便永难实现。所以，我要再说一遍我在本书前几版的序言中说过的话：

“我恳请您悉心地了解约波洛这个人。我们需要他。在这个世界上，他才是我们的未来。什么邱吉尔的滔滔雄辩，罗斯福的大慈大悲，什么联合国的宪章，四大自由，14点计划，梦想家写在纸上的如此四平八稳，如此无可挑剔的规划蓝图，还有什么计划呀，希望呀，条约呀——这一切的一切都保证不了任何东西。能够保证点什么的，只有人，只有人在压力逼来的时候的行为，只有我们的约波洛们。”

纽约

1945年11月

约翰·赫西

第一章

登陆部队来到了阿达诺镇。

一个美国下士神色紧张地沿着肮脏的法维米街跑过来，跑到拐角处他突然卧倒。他三下两下把他的轻机枪架好，然后才回过头去示意他的同伴们跟上来。

在这镇子的另一头，在卡拉布利亚街上，一个三人小组象三只猫一样匍匐前行。忽然一声爆炸，可能是一发迫击炮弹，远远地从北边传来，但显然就在这镇子里——这使他们三人一起卧倒，扬起一片尘土。他们趴在地上等着，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而在位于那座俯瞰全镇的小山之上的卡普钦公墓里，一整排士兵正猫着腰从一座坟墓前靠近另一座坟墓。全排的人都恐慌得很，因为他们与大部队失去了联系。他们对整个情况一无所知。他们已经推进到他们的目的地附近，就是前方不远处的石山脊。但是在继续推进之前，他们想先弄清楚镇子里的情况。

整个阿达诺镇里的美国士兵都是这个样子。他们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但这是他们登陆作战的第一天，所以他们身上的每一条肌肉都绷得紧紧的。

在海港边的一个装运硫磺的码头上，一位腋下挟着公文包的美国少校从第9488号步兵登陆艇那斜斜的跳板上走了下来——唯有他看上去从容镇定，神情自若。

“博尔斯”，他转身对跟在他身后走上码头的中士说，“这简直跟回到了老家一样，有多少次我做梦都梦见这一天啊！”说着他弯下腰去，用手掌去抚摸那码头，然后又在他的毛料裤子上揩去手掌上的灰尘。

这个人就是维克托·约波洛少校，刚刚被任命为代表盟军军事政府接管阿达诺镇的首席市政长官。他中等身材，一身黝黑的皮肤——这是他父母留给他的，而他们是来自佛罗伦萨附近的意大利人。在他的上唇边，留着一撮小胡子。他长着个圆脸，双颊上好象总挂着欢快的笑容，但是他的目光却是认真而又严肃的。他年纪约在35岁上下。

跟着他的中士名叫伦纳德·博尔斯，是个宪兵。他的使命是负责维持阿达诺镇的治安：协助割除意大利人中的坏蛋，同时要利用他们中的好人。博尔斯无所畏惧，什么也不在乎。他是匈牙利人的后代，哪儿都去过，什么都干过：在布达佩斯，他读过医学预科学校；在罗马，他为佩斯特劳埃德极作过通讯社记者；在维也纳，他在一家旅行社里干过一阵子；在马赛，他给一位阔绰的出口商当过秘书；在波士顿，他为《先驱报》作过记者；后来他到了旧金山，在那儿卖收音机。但是，他还不满30岁！他是美国公民，是被挑选入伍的。在他看来整个这场战争不过是个无所谓的大玩笑，而他认为他在这场战争中的使命就是要设法使人们不要把自己搞得太紧张了。

当少校用手掌抚摸意大利的土地的时候，博尔斯说：“您也太动感情了。”

少校答道：“也许是吧。不过要是你到了匈牙利，你也会这样的。”

“啊，不，我不会的。”

少校抬头朝小镇方向望了一望，问道：“你看那里安全了吗？”

博尔斯答道：“有什么不安全呢？”

“那我们该怎么走？”

博尔斯不慌不忙地打开一幅地图。他伸出一根长满雀斑的手指按着罩在赛璐珞封皮下的地图说道：“从这儿，沿巴里诺街走到十月二十八日街，再沿十月二十八日街走到头，就是广场了。”

“10月28日，”少校问：“10月28日是什么日子？”

“那是墨索里尼1922年进军罗马的日子呀，”博尔斯答道。

“这是墨索里尼认为他开始成为大人物的日子。”博尔斯的记忆力无疑是非常好的。

他俩动身朝镇上走去。少校又问：“我不记得日子了，请问今天是多少号？”

“7月10号。”

“那么我们将把这条街叫做‘七月十日街’。”

“瞧您这就开始为街道重新命名了。约波洛少校，下一步您就要开始建立纪念碑，当然先为一位无名战士立碑，然后为您自己也立个碑。我根本不信任你们这些爱动感情又那么看重他妈的良心的人。”

“别寻开心，”少校说。他说这句话的话音里带着一种什么回声，好象他还是个在学校里被别的孩子叫做“窝叭”的孩子似的。尽管他的衣领上佩戴着一片金枫叶领章，他的声音里仍然带着昔日的回音。

这时他们俩已经走上了巴里诺街。街上阒无人迹。镇上所有的人要么已逃进山里去，要么躲进了防空掩蔽所或地窖。街上的房舍残破不堪，而且全是灰色的：灰砖盖的两层小楼，灰色的百叶窗，无一例外地盖满了从炸弹和炮弹坑里腾起来的灰色尘土。这里那里随处可见到被炸弹击中了房子，房子倒了，

灰色的碎砖头便流泻到了灰色的大街上。

在10月28日街上，当他们俩走到第三个路口的时候，便看见地上躺着一个死掉了的意大利女人。她穿的是一身黑衣服。她的右腿被炸断，但是很奇怪，一群苍蝇并不去叮她的残肢，却去叮着地上那一滩黑乎乎、粘乎乎的血和尘土的混合物不飞走。

“太可怕了，”少校说。那一滩血还没有完全干，但是已经开始散发出甜腻腻的，催人呕吐的气味。“真他妈的糟透了，”他说道，“我们竟不得不对我们的朋友也下了手。”

“朋友？”博尔斯应道，“简直是笑话。”

“不是他们，不是象她一样的那些人，”少校说。“他们并不是我们的敌人。我母亲的母亲肯定是个跟她一样的人，不是象她这样可怜的人。我们的敌人在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是那些盘踞在市政厅里的坏蛋。”

“哎，您可要小心点，”博尔斯应道，他脸上的表情说明他又要跟少校开玩笑。“您的办公室就要设在市政厅里。您可要小心，不要也变成一个坏蛋。”

“别胡扯。”少校说。

博尔斯说：“我并不相信您的良心，先生，所以我自任为您的助理良心。”

“别胡扯了”。少校说，话音又带出了昔日的回声。

他们从一所被军舰上射来的炮弹击毁的房子旁走过时，少校说：“炸成这个样子，太糟糕了。”

博尔斯说：“也许这是一个坏蛋的房子吧，您说呢？您最好先别看那房子，先看看那边吧。”他一边说一边指着一条小街，街上的马粪、羊屎、废旧草垫、瓜皮瓜子、鸡肠鸡肚和一团一团的苍蝇。博尔斯接着说道：“在那儿，少校，不存在什么有罪或无罪的问题。存在的是一些有待清除的东西。该您管

的，就是那小街里的事，而不是那座房子的事。”

“我知道我该管什么，我也知道我想干什么。博尔斯，我还知道贫穷是个什么滋味。”

博尔斯沉默了。他发现这位约波洛少校那股严肃劲真是叫人奈何不得。

不一会儿他们就赶到了这个镇子的主要广场，其名曰进步广场。一进广场，就看见了他们要找的那座房子。

这是一座外观威严的建筑。在许多意大利城镇中，您都能看到那种一望而知是临时建造起来的、世界博览会式的法西斯总部大楼，这些建筑的设计样式都是最最时髦的，就象各式飞机一样，还没有用坏就已陈旧过时。但是，阿达诺的这座建筑跟它们不可同日而语。这是一座用巨石修造的古老建筑。在它的二楼上有一个古老的阳台、有许多演说就是从这里向本镇的居民发表的。在法西斯分子掌权之前，这座建筑历来是供国王们使用的。现在，它要归民主国家使用了。他们怕您万一不能从它的外观看出它的权威来，所以，在它的正面赫然横着一排显示王权的浮雕青铜字。在它正面的左角处，是一座钟塔。钟塔顶上立着一副金属框架，显然是设计来悬挂大钟的。这是巴罗克式的，看上去年代十分久远。但是上面并没有钟。

钟塔的墙壁上涂着白颜色的大字：“Il Popolo Italiano ha creato col suo sangue l’Impero lofe-condenrà col sua lavoroelo difenderà confra chiun-que colue sue armi.”

少校指着这些字说：“博尔斯，你看，我们都已经登陆了，这里还写着这样的话：‘意大利的民众以他们的热血建立了这个帝国，他们将以他们的劳动使它繁荣昌盛，他们将拿起武器来保卫它，粉碎任何敌人的进攻。’”

博尔斯应道：“我知道您懂意大利文。我也懂。您不必为博尔斯当翻译。”

少校说：“这我知道。不过请想一想时至今日，这算是些什么话！”

博尔斯说：“当然，只能算是愚不可及的话。”

少校说：“要是他们真的亲眼看见了他们的劳动成果，他们早已拿起武器投入战斗。我敢打赌，我们肯定能教会他们奋起保卫他们已经得到的东西。博尔斯，我在这儿就是要做到这一点。”

博尔斯说：“这也是蠢话。记住那条小街，把它打扫干净吧，先生；您的精力和时间要集中在那条小街上才对。”

说话间少校穿过广场，走到市政大厅那黑色的大门前。他放下公文包，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粉笔，在门上写了这么几个字：“盟军军事政府驻阿达诺行政长官，美军少校，维克托·约波洛，驻此。”

随后他们俩走进大门。迎面是大理石的楼梯，他们拾级而上，一边细心察看周围的情况。上得楼来，他们看见一道门，上面标有 *podestà* 字样，便转身走了进去。维克托·约波洛一看见门内侧的那间办公室，惊讶得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

它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它异乎寻常地大：大概总有70英尺长，30英尺宽。天花板升得很高，地板是一色的大理石。

曾几何时，贫穷在外面的大街上呼号，在沿门乞讨；然而这间屋子，却阔绰得令人目眩。室内的家俱一概是深沉、漆黑的意大利式的，敦实厚重，活象是些半为物，半为水果的东西。窗帘都是花团锦簇的缎子，连墙壁上贴的也都是丝绸料子。

供人进出的门开在靠近房间西南角的位置上。门的右侧有一张宽大无比的桌子，上面还摊放着一些地图和从空中拍摄的照片——这些东西是一支美军团队的军官遗留下来的，因为这一天早上他们曾把指挥所设在这里。在房间的这个角落，还立